

典藏张鸣 No.1

武夫当权 ——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典藏张鸣 No.1

武夫当权

—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 / 张鸣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典藏张鸣；1)

ISBN 978-7-224-10484-4

I. ①武… II. ①张… III. ①军阀统治—中国—民国—史料
IV. ①K261.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926 号

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

作 者 张鸣
出 版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 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16 印张 16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201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484-4
定 价 32.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会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

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

东西来,就興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生导师歆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土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

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 he 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目 录

引 言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 1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 11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 23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 37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 47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 57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 77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 93

第八章

宗教仪式——冯玉祥与唐生智/109

第九章

迷信道术——刘湘与孙殿英/125

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131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161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183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197

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213

第十五章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229

引言：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军阀作为政治文化现象

研究军阀首先遇到的问题：军阀是什么？如果按字面释义，军阀的“阀”有点近乎日常我们所用的“霸”字，因为无论军阀、党阀还是学阀，只要后面缀以这个倒霉的“阀”字，就会变得霸气冲天蛮不讲理，自定规则自说自话。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如果我们还想深究一下“军阀”一词的政治内涵，那么不用花多少气力就会发现两个已经为众多有关军阀的定义所公认的要素，一是专恃武力，二是割据地方，英语“军阀”一词WARLORD，恰到好处地显示了这两个要素（WAR，指军事、战争，LORD意为土地主），无论是西方学者“依军事实力主宰一个地区的人”（谢里登）的定义，还是国内的权威性概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辞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说法往往未见得合理，因为这种定义排除了袁世凯和蒋介石，就是对“据”无定所的冯玉祥也不尽适合，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

所以,无论是我们惯常认定关于军阀的字面含义还是更深一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都是我们对军阀的某种直观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贴切、更合情理地认识军阀,还必须有一种文化的观照。事实上,军阀不尽是蛮不讲理、动辄杀人的军汉,至少也不全是卖国媚外的奴犬,军阀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大一统”和“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交替出现的政治情境。中国历史乱治交替的周期变更,事实上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视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有序),而将大离散的时期视为非常态(无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军阀是无序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亚稳态的产物。

如果还嫌上述两定义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列出所谓军阀的几种必备的条件和特征加以补充。

一、动乱的前提。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体现为文官网络和教化网络的叠加,一旦网络的中枢失灵,离心倾向扩大,

文治背后的武力就会显露出来，形成赤裸裸的军事纷争。原有的统治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了，但又没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军阀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

二、时间阶段性。历史上从不存在孤立单个的军阀，作为政治动乱时期的特有现象，军阀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多数军阀是短命的，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它们是短暂的过渡性事物，甚至军阀自身对自己的这种暂时性也有所感觉：无论是统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义还是对空头中央政府认可的斤斤计较，都映射出他们某种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统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方式，尽管骨子里是武力的内核，但却有一种文治精神的表象，社会流行风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而军阀统治恰恰相反，表现为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军人专制，武化阶层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讲规矩，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很有丛林时代的特质。

四、政治形态上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军阀间的相互吞并、分化与重组，在时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军阀向全国性军阀的演化，每个时代全国性军阀的出现，既标志着军阀时代的极盛，同时也是军阀时代结束的征兆。三国的曹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以及近代的蒋介石，在某种

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由乱世走向传统文治的最后的铺垫。袁世凯作为清末半独立的督抚们的一个总结，本来具有过渡到传统文治、结束动乱的意向，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他自身的种种因素，却使这一意向滞后到了蒋介石那里，而其时中国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传统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是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它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大动乱的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绪余，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军阀也有自己生长发育消亡的过程，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差异，这种过程也有相当的不同，有的由于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像明末；有的由于异族的介入而融汇于民族主义，像南北宋之交；有的则是以上两种情形的叠加，像东晋及南北朝；还有的由于割据势力的某一方力量膨胀得过于迅速，从而使军阀仅在初生态就中止了发育，如秦末、西汉末、隋末等。军阀现象发育比较完全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东汉末—三国；二、唐—五

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集团的瓦解，前后七八年时间，为军阀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在与黄巾军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各种武装势力乘机而起，有地主豪强，有州郡长官，有起义军转化成的武装，甚至还有名士（如刘表和孔融）割据州县，相互攻杀，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统治形势极度紊乱，整个社会系统的无序度达到最大，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多数军阀有意无意成为社会大破坏的罪魁，他们在争战中疯狂屠杀无辜，对据地的老百姓则无限度地剥掠。

从董卓败亡到赤壁之战这十六七年为军阀的发育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董卓败亡到官渡之战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间的分化与重组进入一个台阶，一大批小军阀在竞争中消失，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公孙赞、吕布、刘表等初具规模的军阀集团。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为后期，中原逐鹿的结果，曹氏集团一枝独秀，大有气吞诸侯一统天下之势，成为具有统一意向的“中央性”军阀集团。发育期的总特征是军阀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大而且轮廓清晰，社会的聚合趋向开始起作用，以往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已经威胁到了军阀自身的生存，所以各个军阀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内部的巩固与生产的恢复，如屯田制等措施的实行，士家制的军事制度的推行等，后期中央性

的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军阀现象成熟的开始。

从赤壁之战到魏、吴、蜀三国各自建立独立政权这十余年,为军阀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武人为主、文士为辅的政治格局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全国范围三大军事集团鼎足而立,各自开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复和巩固方面,战争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大幅度减少,相继开始了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化。待到这一时期结束,三国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渐压倒了武人,出现了像蜀之诸葛亮、魏之司马懿、吴之陆逊等文人主军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距常态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相去不远了。

“唐—五代”军阀的演进也经历了类似的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阀是由声势赫赫、国力强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强盛国力所生出的无边野心,是军阀诞生的催生婆,累年的黩武政策,使府兵制瓦解,代之以雇佣兵制施行。为了方便军事行动,边境上形成了一系列手握重兵、军政合一的武将型的节度使,造成军事上严重的内轻外重内部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条件,军阀才例外地出现于王朝的盛世。当唐朝君臣沉湎于国泰物丰的升平歌舞之际,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此后中央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相持,双方消耗殆尽之际,中经黄巢大起义的转换,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军阀取代了老军阀。如果把安史之乱时期视

为“唐—五代”军阀的诞生期，那么它的发育期（从安史乱平到黄巢入京）和成熟期（从唐亡到五代结束）则特别的漫长，而且由发育到成熟，还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军阀的初始态消亡，但这种现象却经过长时期的发育，在新的形态上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近代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显然，这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军阀现象出现的时机超前和蛮族参与过程这两种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统一王朝还具有相当力量，结果就遏制了军阀的进一步发育，使之成为生长迟滞的侏儒，非得经过更新换代，蜕皮变换，把前一阶段发育成熟的各种因素注入新的机体之中，才能开始它的成熟期。后者，由于蛮勇好武少文的异族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阀更具蛮武色彩，对“长枪大剑”过于执迷和对“毛锥（笔）”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

义名义开始割据。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再次,影响军阀发育